

辨僞叢刊之

朱熹辨偽書語

白壽彝輯點

朱熹辨僞書語

白壽彝編集

辨僞叢刊之一

樸社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（一千冊）

實價大洋四角

著作者朱

編集者白壽彝

社局書社

北平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

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

印 刷 者

總發行所

總經售處

景山書社

社

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

模社出版經理部

序

辨僞書的事，是老早已經有的了。漢書藝文志於文子等書，就稱其出於後人底依託。此後顏師古柳宗元等也都有些辨僞的話。但在漢唐的時候，辨僞書的人畢竟是太少了，辨僞書的人所辨的僞書也很有限。到了宋朝，這種事情才算比較地活潑起來。如歐陽修之辨易繫辭，王安石之疑春秋，鄭樵之攻詩序，汪應辰之不信孝經，葉適之不信管子晏子，差不多辨僞書的事已成了一種小小的風氣。在這種風氣裏，朱熹底收穫最多，只就這一個小冊子裡所輯得的說，他所辨的書已達四十種。

朱熹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收穫，除了時代的關係外，約有三個原因：第一，朱熹是在小孩子時候就喜歡發問題的。黃幹朱文公行狀說：

『先生……幼穎悟，莊重能言。章齋指示曰：「此天也。」問曰：「天之上何物？」（正誼堂本黃勉齋集卷八頁一，後面）黃義剛記朱熹自述：

『某自五六歲時，便煩惱道，天地四邊之外是甚麼物事。見人說四方無邊，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。如這壁相似，壁後也須有甚麼物事。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。』（應元書院本朱子語類卷九四，頁十二，後面。）

像他所問的這種問題，在普通的小孩子中間也是常有過的，不算希奇；但像他這樣地肯『思量得幾乎成病』，却是極不易找。他這一點懷疑的傾向，以後隨着年齡增長起來，成爲他治學問的一種態度。在六十多歲的時候，他還告訴葉賀孫說：『學者讀書，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。』至於羣疑並興，

寢食俱廢，乃能驟進。」（語類卷十，頁二，後面。）

第二，朱熹讀書，是主張專一的。他說：

『讀書須是窮究道理澈底；如人之食，嚼得爛方可嚥下，然後有補。』（李杞錄，語類卷十，頁二，後面。）

『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，要透徹方能得脫離。若只略略地看過，恐終久不能得脫離，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。』（潘時舉錄，語類卷十，頁三，前面。）

他自己就是有這種讀書的習慣的，『方其讀上句，則不知有下句；讀上章，則不知有下章；讀中庸，則祇讀中庸；讀論語，則祇讀論語。』（楊道夫錄，語類卷一〇四，頁一，後面。）他這種習慣，可以說，已養得很堅牢了。

第三，朱熹所感到的學術興趣，方面頗多。在他初爲學的時候，固然『

這邊也去理會尋討，那邊也去理會尋討，（葉賀孫錄語類卷一〇四頁七前
面，）『禪道文章，楚詞，兵法，事事要學。』（包揚錄，語類卷一〇四頁十後面。）
到了後來，他的學術興趣集中了，他的中心思想已經有了，他所致力的學
術仍舊是不限於一方面的。對於哲學，他所用的精力自是特別地多，但他
在歷史方面的著述——通鑑綱目——是在四十三歲的時候完成的，在文
學方面的著述——楚詞集注，辨証和後語——是在七十歲的時候完成的，
這些也都是很吃力的工作。從這裏，我們就可看出中年和晚年的朱熹，不
只沒有停止了他的多方面的發展，並且他的多方面的發展差不多都能達
到相當的高深程度。這頗可使我們想像朱熹底博大——他在當時所擁
有的知識的豐富。

本來一件虛偽的事或物，在一個博學者底眼中，是較易露出破綻來的。

他見過的多了，聽過的多了，懂得的多了，他在過去積累了許多的知識，可以拿來分析或比較當前的事物。雖是這當前的事物對於他或者完全是生疏的，但只要他對於這事物底關係者能多明白一點，則這件事物底原形——至少是一部份的原形——就立刻呈露了。朱熹有了博學的本領，他可以從許多方面得到暗示，他可以從許多方面探獲工具。就這一點，偽書就很可以在他面前失敗了，他的辨偽書的成績就已經可以比較地多些。更加以他的懷疑精神，根本不預先存一個信仰的成見；他的專一工夫，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剝審問：於是，一批批的偽書更不得不血肉狼藉，尸身橫陳了。

朱熹辨偽書的方法，他自己會告訴過袁樞說：

『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，所以能別其真偽者，一則以

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，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。未有舍此兩塗，而能真以臆度懸斷之者也。」（答袁機仲，四部叢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八，頁五，前面。）

這一段話，就是他辨僞書的方法論。所謂『義理之所當否』是就理論方面說。所謂『左驗之異同』是就証據方面說。

在理論方面，朱熹所應用的，是根據常識來推測。如他所說：

『孔壁所出尙書，如禹謨五子之歌、胤征泰誓、武成、問命、微子之命、蔡仲之命、君牙等篇，皆平易。伏生所傳皆難讀。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，到於易底全記不得？此不可曉。』（萬人傑錄，語類卷七八，頁二，前面。）

『管子非仲所著。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，稍閑時又有三

歸之溺，決不是閑工夫著書底人。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。

不知何氏錄，語類卷一三七頁一，前後面。)

這都是因為關於這些書底來歷的傳說和一般的經驗不符，因而對於這些書底真僞發生問題的。

在証據方面，朱熹所用的約有五種。如他說：

『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，蔡季通識其人。』

（滕璣錄，語類

卷十九，頁十六，前面。）

這是因確知作僞者是誰，而知其書爲僞書的。

『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，行實之類不載，但言行錄上有少許，不多，不見有全部。專破古說，似不是胡平日意。又間引東坡說：東坡不及見安定，必是僞書。』

（不知何氏錄，語類卷七八，頁一

一，後面。)

這是因一書底內容與歷史上的事實不符，而知其書爲僞書的。

『孝經，疑非聖人之言。且如「先王有至德要道」此是說得好處。然下面都不會說得切要處，但說是孝之效如此。如論語中說孝，皆親切有味，都不如此。』（林賜錄，語類卷八二，頁二，前面。）

這是因一書中的思想與其所依託的人之思想不符，而知其爲僞書的。

『如「言斯可道，行斯可樂」一段，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，在左傳中自有首尾，載入孝經都不接續，全無意思。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，全無義理，疑是戰國時人所湊出者。』（黃營錄，語類卷八二，頁一，後面。）

這是因一書中的內容之抄襲湊合之迹顯然可見，而知其書是僞的。另外，

從文章或詞句上，朱熹也辨別出書底真僞來。如他說：

『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。漢文麤枝大葉。今書序細膩，只似六朝時文字。』（黃義剛錄語類卷七八，頁八，前後面。）

這是從一書之文章的氣象上，知其書僞的。

『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……嘗示予以潛虛別本，則其所闕之文尙多。問之，云：溫公晚著此書，未竟而薨，故所傳止此。……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，則首尾完具，遂無一字之闕。』

始復驚異，以爲世果自有完書，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。讀至剛行，遂釋然曰：此贗本也。……本書所有句皆協韻，如易象文象，玄首贊測，其今有而昔無者，行變尙協，而解獨不韻。此蓋不知「也」字處

未，則止字爲韻之例爾。此人好作僞書，而尙不識其體製，固爲可笑。然亦幸其如此。不然，則幾何而不遂至於逼真也耶？」（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文集卷八一頁十前面。）

這是從一書之文章的體製上，知其書僞的。

『麻衣心易』頃歲嘗略見之，固已疑其詞意凡近，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。……此書所謂「落處」「活法」「心地」等語，皆出近年，且復不成文理。計其僞作，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。（書麻衣心易後文集卷八一頁十三前面。）

這是從一書所用的詞句上，知其書僞，並能斷定其作僞的時代的。這幾種証據，有時朱熹只應用一種或兩種，有時應用到兩種以上；但同時用五種証據去辨明一書的，差不多沒有。

朱熹辨僞書的方法，無須諱言地，還很幼稚；他所有的辨僞書的話也大半過於簡單。但所謂幼稚，是和後來考証學發達起來時的情形比較而言的。在當時能提出一種辨僞書的具體方案，並能應用這樣多的方法的人，恐怕還是要推朱熹爲第一人了。他辨僞書的話雖大半過於簡單，但在簡單的話裏，頗有一些精采的見解，給後來辨僞書的人不少的刺激。

朱熹是曾想作一部書，專門辨僞書的。他在孝經刊誤附記裏說：

『孔叢子亦僞書，而多用左氏語者。但孝經相傳已久，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，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。孔叢子叙事至東漢，然其詞氣甚卑近，亦非東漢人作。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，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，皆甚可笑；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，以前書考

之，亦無其實；而通鑑皆誤信之。其他此類不一，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。』（文集卷六六，頁八，前後面。）

大概因為終於沒有閒暇，這部書畢竟沒有著出來；他辨僞書的話只散見於文集和語錄裏。所有在文集和語錄裏的話，我已努力收集；也許可以說，它們已全收在這本小冊子裏了。

這本小冊子所採用的書，有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晦庵先生文集和別集，同治壬申應元書院刊本朱子語類，及正誼堂本詩傳遺說。採輯各條，都注明所見原書卷數，頁數及頁之前面或後面，和原文題目或記錄者姓名，並加標點符號和分段。原文有專論僞書的，則全行採入；有是偶而涉及僞書的，如與文義無礙，則只採取這幾句話；有因係答人疑問，非載原來問題不能使文義明白的，則連原問一併採入，而於每段原問低六格寫。還有些話，並

不一定要辨明某書是僞書，而是訂正傳說之謬的，因與辨僞書的性質有幾分相近，也一併收入。語錄中，朱熹話裏往往攏雜着記錄者底話，而朱熹話在這時候又不當分段，則將記錄者底話用括弧括其兩端，字體仍與朱熹話所用字模大小一律。編次的方法，略依舊日的四部分法，沒有採用甚麼新的意見。

這雖是一本薄薄的，而且並不怎樣費我自己心思的小冊子，但當我尋找材料的時候，是在細心地讀着朱熹底原著，是在細心地找尋着，總還不是一本臨時湊成的東西。這一點忠實，我是敢向讀者表白的。

編這小冊子的動機，是顧頡剛先生提起的。黃子通先生會迭次催促它的完成，許地山先生給它題名子。我對三位先生都致謝意。

二〇，九，一八，白壽彝於北平。

